

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 政治發展策略下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徐蕙萍

新聞學系

副教授

摘 要

中國大陸自實施「經改」以來，經過 20 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準大幅的提高，社會也日趨開放，雖然在中國大陸的內部也迭有『政治改革』的呼聲。可是，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社會變化中，眾所矚目的『政治改革』卻始終有如蝸步般。無怪乎有不少人會質疑，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只想保持現狀，並無意願真正從事進一步的改革。但在中共一再表示其當前施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下，其政治發展策略為何？然而一向被視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在穩定政權為前提下的政治發展策略中，它們在其間扮演何種角色？中共又冀望其發揮何種作用？是值得探究的。經過探究，中共現階段的政治發展策略，無非是針對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發展衍生的問題所做的調整；至於新聞媒體在其間扮演的非但是共黨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並是中共政令宣導的鼓吹者以及在國際上塑造中共「和平發展」形象的傳播工具。

關鍵詞：政治發展、政治發展策略、新聞體制、新聞政策

壹、前言

二次大戰後，開發中國家紛紛致力於其國家的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所謂政治發展，就是政治現代化的歷程；是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在政治領域所發生的變遷（楊宏山等，2004：8）。中國大陸當然亦不例外；中共建政以來，開始實施馬列共產主義，結果卻建立了一個黨國一體、且控制人民經濟、教育、文化等面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在當時「政治掛帥」之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令中國大陸的經濟幾乎至崩潰性的局面，也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所謂的「再不改革，可能就要亡黨亡國」的狀況；遂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出「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開始致力於現代化的發展（楊宏山等，2004：24；何川，1994：2）。

中國大陸自實施「經改」以來，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準大幅的提高，人民的平均收入，從當年的150美元躍升到現在的1300美元，社會也日趨開放，雖然在中國大陸的內部也迭有『政治改革』的呼聲。可是，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社會變化中，眾所矚目的『政治改革』卻始終有如蝸步般。

然而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何以能在快速經濟發展帶動的社會變化中，政治卻相對地顯得穩定，或許就誠如最近中國大陸旅美學者斐敏欣在其著作《中國落入陷阱的轉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所指出的：「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不但不會將其導向民主，反而會對民主造成不利的影響；因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強化了人民對當權者的認可，強化了當權者的合法性。所以富裕產生不了民主化的條件，反而移除了要求民主的壓力。原因是經濟發展給權力壟斷者帶來很大的資源，將社會中新興的精英納入體制中，結果弱化了社會中的反對力量」。因此斐敏欣明白表示，「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只想保持現狀，並無意願真正從事進一步的改革」（《蘋果日報》，2006/4/19）。雖然如此，中國大陸近來卻迭有政治改革的呼聲（楊宏山等，2004：25），甚至有學者直言，「沒有政府體系與經濟發展的同步完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失去一項基本的保障條件。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變革都昭示我們，推進政府體系的優化，關係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能否發展，關係到經濟體制以及其他體制的改革能否順利進行，關係到社會生產力能否得到解放和發展，最後關係到實現社會安定，政府廉潔的政治局面。」（曹沛霖，1998：7）。

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不少人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也有樂觀者，認為中國大陸一定會出現民主，只是時機未到。姑且不論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是否會走向民主，抱持樂觀與否；然而在中國大陸政治改革蝸步化，經濟快速發展帶動的社會變化中，已衍生不少問題，則是不爭的事實，如：貧富不均、城鄉差距、貪污腐化，農村及社會流動問題…等，無怪乎，中國大陸近來迭有政治改革的呼聲。但在中共一再表示其當前施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何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又胡錦濤、溫家寶在穩定政權為前提下，其政治發展策略為何？是筆者研究本文的第一個動機。

一向被視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在近年逐漸走向產業化、集團化的狀況下，並在胡錦濤、溫家寶穩定政權為前提下的政治發展策略中，它們在其間扮演的角色與作用為何？則是筆者研究本文的第二個動機。

適值經濟全球化之際，兩岸經貿交流持續擴張，但另一方面，兩岸卻在政治上升高對抗之際。中共的任何措施，對兩岸關係皆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一探中共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下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兼具學術與實用性的。更何況，目前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的狀況下，愈凸顯本研究的意義；在本文中將以現代化理論、政權穩定理論作為分析的張本，並以文獻分析法針對上述問題一一探究之。

貳、新聞媒體與國家政治發展

一、政治發展的概念

在尚未何謂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在尚未界定之前，必須先了解「發展」的定義，雖然其界定亦是眾說紛紜，但針對亞洲、拉丁美洲國家而言，「發展」可能是下面的一種或多種意義。歸納言之，其操作性定義為（蕭新煌編，1985：26）：

- （一）經濟轉型：持續與快速地增進國家生產，「決策中心」成功地發展製造工業，俾使國家有辦法自主地決定未來的成長。
- （二）社會轉型：收入平等分配，人民能普遍取得「社會財貨」(social goods)，如教育、醫療衛生服務、住宅、娛樂設備等，和參與政治決策。
- （三）文化轉型：重新肯定國家意識與傳統。

至於政治發展，則有狹義上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權力結構的分配、政府與社會的互動與溝通等；也有認為是泛指政治經濟層面的發展（王佳煌，1998：3）。

學者陳鴻瑜認為：「政治發展的概念，乃是指一個政治系統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其結構漸趨分化、組織漸趨制度化，人民的動員參與支持越來越強，社會越來越平等，政治系統的執行能力也越來越強，使政治系統之發展過程構成了一種連續的現象。」（陳鴻瑜，1992）。

有政治學者直接認定為：就是政治現代化或西化（王佳煌，1998：2）；而中國大陸學者楊宏山等（2004）則明白表示，政治發展就是政治現代化的歷程；是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在政治領域所發生的變遷。

一般社會科學學者大體上認為，政治現代化的意義，至少需以下列三個標準來論斷：一是政治體系的結構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的高低程度；二是政府能力，特別是規劃能力、運籌及合理分配資源之能力的大小程度；三是政治體系民主化的程度（黃城，1989）。

基本上，學者多認為是指涉一個政治系統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其結構漸趨分化、組織漸趨制度化，人民的動員參與支持越來越強，社會越來越平等，政治系統的執行能力也越來越強，使政治系統之發展過程構成了一種連續的現象。

二、新聞媒體在國家政治發展中的角色

大眾傳播是一群經過組織化了的個人或一個「傳播組織」，利用某一媒介，有系統地將大量的消息、知識、觀念態度等，傳送給廣大群眾的過程。無論在哪一種制度下，都有著如傳播研究先驅拉斯威爾（Lasswell,1936）所說的：「偵察環境」、「協調正反」和「傳遞經驗」的作用。它是個環境的瞭望者，政策的塑造者，知識的傳授者，也是精神的調劑者（鄭貞銘，1981：95）。

基於此，新聞傳播媒體在國家政治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傳播學者鄭貞銘認為，新聞傳播媒體在開發中國家是一個改變的代理人（change agent），它扮演了三種角色：（1）瞭望人與報導者。（2）決策者與領導人。（3）教師。學者鄭貞銘明白指出，在開發中國家，大眾傳播的成長必須與其它建設如教育、經濟、政治等齊頭並進，唇齒相依，事實上，它本身並無作用，可是由於它有擴大、複製的特性，以及報導、解釋、忠告、娛樂的功能，故在民智未開的開發中國家，能很經濟的執行許多任務，所以深受重視（鄭貞銘，1981：95-96）。

從國內外的研究顯示，新聞傳播媒體對人們認知能力的增強，建立觀念的新知識，已有肯定性的貢獻，例如：勒納（Lerner,1958）在研究如何有效運用大眾傳播媒體以促進國家發展時指出，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可以提高民眾識字率，藉以作為提升民眾社會參與、政治參與、經濟參與的基礎，同時可擴展人類的環境，並加強人類應付現代化中的「社會整合」、「內聚力」、「和諧

關係」、「分工」、「創新」與「意識培養」等社會能力（鄭貞銘，1981：96；林東泰，1999：197）。當然，傳播學者大多認為，其前提必須是此社會必須已具備若干必備的要件，如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年齡等到達一定水準，大眾傳播媒體的接觸必然會促使人們的「同理心」（empathy）、創新力、政治知識，成就動機以及教育或就業的願望顯著的增加。

因此，新聞傳播媒體在國家政治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基於它有擴大、複製的特性，以及報導、解釋、忠告、娛樂的功能，故而特別是在民智未開的開發中國家，因能經濟的執行許多任務，所以深受開發中國家的重視。

三、新聞媒體與國家政治發展的關係

基於新聞傳播媒體的提供資訊、公共論壇、教化傳衍和娛樂等功能而言，一旦大眾傳播事業發達，必然促進民眾重視攸關自己權益的公共事務和經濟政策，所以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自然而然應運而生。人們從新聞傳播媒體獲得有關公共事務的各種資訊與聲音，他們也會藉由媒體表達他們的意見與立場，因而促進了政府與民眾對政治和經濟事務的溝通，也直接促進了民主政治的落實。而當民眾可以對他們所關心的政治和經濟各種事務表達他們的意見與立場時，政府各項決策都必須考量民眾的想法，這也就是傳播學者勒納等人以英、美為樣版的所謂「現代化國家」景象（林東泰，1999：200）。

基於此，也就說明新聞傳播媒體非但在國家政治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它亦與國家政治發展有著極大的相關性或因果關係。就誠如學者鄭貞銘（1981）所明白指稱的，大眾傳播是構成國家現代化過程的必要份子，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媒介「闡示」並「觸發」現代化過程；換言之，前者擔任後者的「設計人」與「推動者」的角色；而此種關係是彼此互賴，而相互作用的。

綜合以上可知，基於新聞傳播媒體具有擴大、複製的特性，以及報導、解釋、忠告、娛樂的功能，所以特別是在民智未開的開發中國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深受開發中國家的重視，如果說它與國家政治發展有著極大的相關性或因果關係，亦是不爭的事實。

參、中共的新聞傳播觀及其在政治發展中的運用

一、中共的新聞傳播觀

中共高層堅信：「建立政權和鞏固政權靠的是兩桿子：一是槍桿子，一是筆

桿子（主要為宣傳媒介）」（何舟，1993：94）。共產黨人之所以如此重視新聞傳播媒體，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共產革命之經驗，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首就共產革命之經驗來說，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幾乎所有重要的共產主義運動領袖，都曾從事過報業或宣傳工作，這些個人直接經歷，以及傳媒在革命期間對思想趨於簡單之民眾所起的明顯煽動和組織作用，甚至對其敵方所起的攻擊作用，無疑的，這一切均使共產革命領袖們從實踐上意識到傳媒的重要性（何舟，1993：96）。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則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等人在新聞傳播方面的論述，後由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等人再作闡述、豐富之。若仔細審視中共的新聞傳播觀，擇其要者，不外乎下列四項，分述如下：

（一）喉舌、工具論

中共承襲馬克思主義關於新聞傳播的「工具論」。馬克思認為新聞傳播也像其他國家機器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

這種「工具論」，經過毛澤東、鄧小平等的詮釋下已成為「喉舌論」。即便在中共高層領導中屬較開明者，如前總書記胡耀邦，亦不例外（何舟，1993：95）；胡耀邦於1985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甚至進一步將新聞傳播活動的性質和地位作了清楚的界定。他明確指出，「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胡耀邦，1985：1）。1989年11月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一再重申此「喉舌論、工具論」，他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始終認為，國家的報紙、電台、電視台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

按照中共「喉舌論、工具論」的邏輯，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因此，人民不需要、不必要，也不能夠擁有自己的喉舌（新聞傳播媒體），這也充分顯示中共獨占新聞媒體，把它作為鞏固其統治的用心（何川，1994：45）。

也就由於在中共統治下，新聞傳播媒體淪為共黨的統治工具，其非但無法像自由民主國家的新聞媒體那樣扮演輿論監督的角色，亦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守望環境、協調統合的功能、傳演文化的功能及娛樂的功能（林東泰，1999）。

（二）黨性原則

基於報業等新聞傳播媒體被中共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造成其主要功能亦被界定為「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服務」（毛澤東，1958）。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則明白表示，「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必須堅持黨性原則」（江澤民，1990：189）。

所謂「黨性原則」，依照中共的說法就是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在政治上和共黨

中央保持一致，在組織上無條件地接受黨委的領導，遵守共黨的紀律，一切重大宣傳方針都必須向黨委請示和事後向黨委匯報，所有新聞媒體的重要言論要經過黨委集體討論，各新聞單位必須遵守「不得自以為是，不得發表與共黨中央決定相反的言論」的規定，否則將遭到查封、停刊的命運（何川，1994：46；盛沛林主編，2000：220；邵培仁、陳兵，2003：18）。

事實上，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一言以蔽之，即在鞏固政權為前提下，不但新聞傳播媒體本身必須接受共黨的領導，增強所謂的黨性，甚至於其刊載的內容完全得根據政治的需要進行變化或修改，但亦使得報紙等新聞媒體皆以「對共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有利與否」為新聞取捨之衡量標準；凡是對共黨的方針政策有利的，就是最大的新聞，就要連篇累牘地大肆宣傳，否則再大的新聞事件也可以壓下來不報或晚報（邵培仁、陳兵，2003：16；何川，1994：41）。無怪乎，中國大陸的學者甘惜芬對於其報紙長期以來的現象，也不禁搖頭嘆息；他曾在《上海經濟導報》，發表〈多種聲音，一個方向〉專文中，對中共報紙有所評價，略述如下（徐蕙萍，1989）：

- 1.是迫切需要瞭解的新聞不多，而不感興趣的新聞太多；
- 2.是不把真相告訴人民；
- 3.是對領導人一味歌功頌德，沒有輿論監督；
- 4.是不敢大膽批評時弊，繞著矛盾走；
- 5.是不能代表人民向國際發言；
- 6.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與官方不同的意見；

上述的評價，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甘惜芬教授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所發表的觀感；然審視當前的中國大陸報業等新聞媒體，即便經改已令其有不少變化（徐蕙萍，2004：175），但在這所謂的「黨性原則」下，仍較難發揮猶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輿論監督的功能。

（三）輿論導向的灌輸性

誠如上述，在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為目的。事實上，早在一九四八年，毛澤東就強調：「黨報的基本任務是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以及黨的政策」（毛澤東，1990：71）。

被中共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的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在中共嚴密掌控下，無論是新聞媒體報導的方向或內容，都是由中共中央來決定的，此即中共所謂的「輿論導向」（何川，1994：108）。具體而言，中共所要求的「輿論導向」，必須依照中共的價值標準來影響傳播方向，這個價值標準就是共黨的意識型態及其方針、政策（何川，1994：87）。事實上，中共也明白表示，其「強

調輿論導向的目的，即在於希望各種非主流的思想觀念，以及其他一些屬於主流思想的形式不一的思想觀念，能夠同現實的意識型態協調，趨向於它」，中共甚至毫不避諱地指出，「至少不要影響現實意識型態對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陳力丹，1999：27）。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指出：「歷史經驗反覆證明，輿論導向正確與否，對於我們黨的成長壯大，對於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對於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繁榮富強，具有重要的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人民日報》，1996/9/27）。

中共通過對新聞媒體運作的控制，使輿論導向循著其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政治的需要發展，這種以灌輸為目的的宣傳觀，一直被中共貫徹實施中。

（四）正面宣傳的原則

論及新聞，新聞從業人員每天採訪新聞、編輯新聞，對於新聞的界定，或許各有殊異。一般而言，新聞媒體較偏重於時效性（timeliness）、接近性（proximity）、顯著突出（prominence）、後果（consequences）等作為選擇新聞的標準。若由媒體組織觀點而言，新聞是知識產品也是經濟產品，新聞必須符合企業目標，來自企業內部的控制很難避免，而新聞媒體也必須與其他政經團體互動。再者，新聞除了是企業成品外，更是新聞人員綜合其專業素養與人生歷練的文化產物（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09）。

基於此，雖然客觀、準確與平衡公正是新聞品質的主要象徵，但經過層層的產製與守門過程，新聞實在很難達成絕對客觀與公正（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210），則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新聞的真實性則是新聞理論和新聞實踐的一個基本問題，新聞的價值、規律和功能都是以真實性為基礎。報導不真實，新聞就不成為新聞，新聞媒體亦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但是在中共的新聞政策中卻強調真實性要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亦明白指出：「我們所說的新聞的真實性，同新聞工作的階級性是一致的」（江澤民，1990：190）。易言之，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所刊載的新聞，真實性並非首要，一切都必須服從於黨性和階級性，也就是所謂的新聞要為政治服務。

基於此，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遵循的一條極為重要的方針。依據中共的說法，「所謂堅持正面的宣傳，就是要準確、及時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主流，讓人民群眾創造新生活來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們前進的巨大精神力量」（李瑞環，1990：201）。

若檢視中共建政以來新聞傳播媒體所謂的堅持正面宣傳，簡言之，就是「報喜不報憂」。中共對此不但在理論上有系統的闡述，甚至已形成一整套指導新聞

媒體運作的原則與規範。特別是在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所有報紙、電台都充斥著「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所謂「浮誇新聞」（何川，1994：52）。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中共對正面報導制定了嚴格的限制，規定：歌誦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光明面的報導，與批評社會主義缺點和陰暗面報導的比例為八二開，此即所謂的八二開的「計劃新聞」。事實上，此為胡耀邦於1985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時規範的，胡耀邦指出：「因為社會主義的主導方面是光明的，同時也存在著黑暗面，所以報紙上，大體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稿批評。即使是陰暗面，也要注意態度問題，一定要指出我們有信心消滅它」（胡耀邦，1990：288）。

新聞報導若「報喜不報憂」，即使沒有虛構，亦非真實的；因為新聞，只是正面報導，反映的亦不是社會真實的現實，中共此種「以正面報導的宣傳方針」，肇致的結果則是「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

綜上所述可知，也就因為中共的新聞傳播只是為了宣傳，其傳播導向就是以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為目的。這也就造成其傳播媒體所刊載的新聞，僅為社會化的過程，不但毫無「客觀」可言（張多馬，1995：32），甚至在其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新聞方針下，新聞報導只「報喜不報憂」，造成「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這一切都是中共新聞傳播觀及其衍生的新聞政策所肇致的。只要中共新聞為政治服務的信條存在一天，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媒體就無法改變這種「弄虛造假」、「浮誇新聞」充斥於媒體的狀況。當然為共黨鞏固政權的工具性角色亦始終無法擺脫。

二、中共新聞媒體在政治發展中的功能與運用

（一）新聞媒體在中國大陸體制下的結構與功能

1. 中國大陸體制下新聞媒體的角色與功能

新聞傳播體制是指一個國家的新聞傳播事業的總體結構以及國家對新聞傳播事業和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協調和管理的體制（李瞻，1981）。然經學者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新聞傳播體制總是同那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密不可分的（何川，1994：31）；易言之，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有什麼樣的新聞體制。新聞傳播體制中包含的國家和政黨同新聞傳播事業的關係、傳播媒介歸誰所有，傳播機構的經營管理方式等因素，都決定於政治制度。

檢視當前各國新聞事業之模式，雖說各有其不同的模式；然就政治制度的角度來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有二種：其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

新聞體制；其二，昔日是蘇聯為代表，當蘇聯解體後，現則是以中共為代表的極權主義新聞體制（McQuail, Denis, 1987; DeFleur, Melvin, 1982; Chang, Won Ho, 1989）。

中國大陸現行的極權主義新聞體制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基礎之上的（Howkins, John, 1982）。這種極權制度，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專制和獨裁以及對大眾傳播工具的壟斷，和對所有經濟生活面向的控制（林文斌、劉兆隆譯，1998：45）。檢視中國共產黨極權政權的建立及其統治的延續，所依恃的，就誠如中共自己所言的，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具體而言，即中共一方面通過他掌控的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實行極權統治；而另一方面則利用它所控制的新聞、出版等機構，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以達到效忠極權政治的目的。也就是說，人民不但不可能像自由主義新聞體制般利用新聞傳播媒體對中共實行監督和制衡甚至連自由表達思想、言論和獲取信息的自由都沒有。中共利用其所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將自己的一套政治規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和政治認同灌輸到中國大陸每一個人的思想中，進而內化為行為取向共產主義的政治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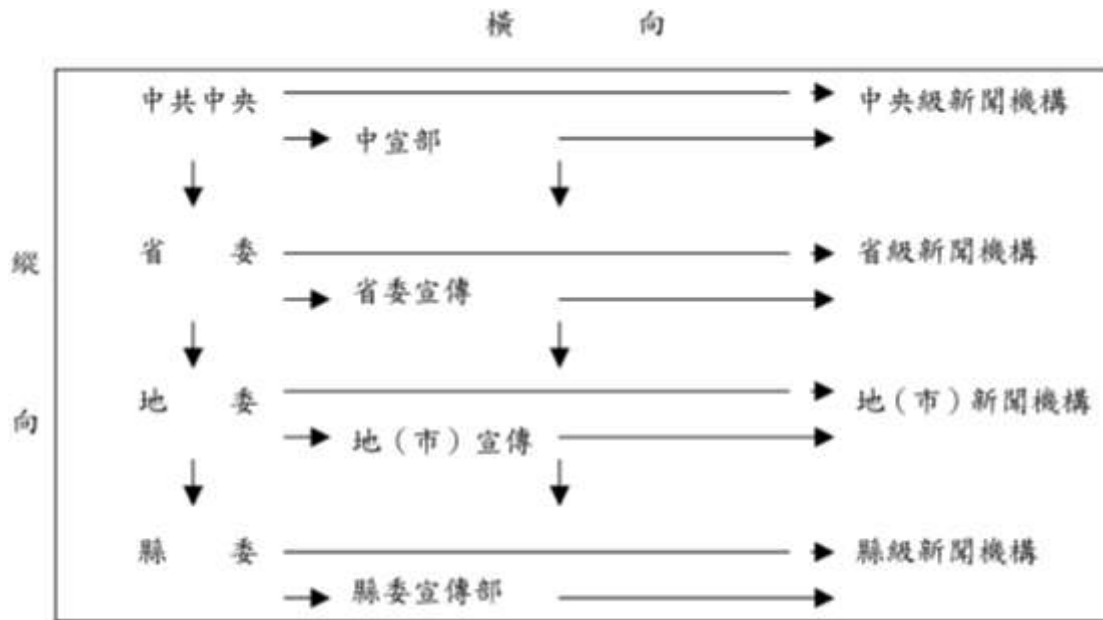
簡言之，在中共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下，其新聞傳播媒體完全淪為一黨專政的工具。在這種體制下，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社等大眾新聞媒介，都在中共的統一領導之下，通過共黨的各級宣傳部門的協調管理和其各級黨委對同級新聞機構的直接領導，並由不同時期新聞政策的引導來進行運作（周鴻鐸等，1997）。

基於新聞傳播媒體被中共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致使其主要功能亦被界定為「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服務」（毛澤東，1990）。審視當前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即便經改已令其有不少的變化，但在其未擺脫「喉舌」的工具性角色之前，則較難發揮尤如自由主義新聞體制下傳播媒體應有的守望環境、協調統合的功能、傳衍文化的功能及娛樂的功能（鄭貞銘等，2003）。

2. 中國大陸體制下新聞傳播媒體的結構

基於中共將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通訊社等大眾新聞媒介，都視為其「喉舌」，應為政治服務的定位下，所有的新聞傳播媒體都得在中共的統一領導下，其間通過共黨的各級宣傳部門的協調管理和其各級黨委對同級新聞機構的直接領導，並由不同時期新聞政策的引導來進行運作，致使中國共產黨不單是大陸所有新聞傳播媒體的所有者，亦是它的管理人。它通過其龐大、繁雜的各級權力機構，從組織上控制了整個新

聞系統，使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貫徹執行。依據學者何川(1994)的研究，中共是以縱橫交錯的双重分等級的管理方式來掌控新聞傳播媒體。就縱的方面而言，中共中央有關意識型態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意識型態宣傳小組所轄的中央宣傳部，以及各級黨委的宣傳部門對同級別的新聞機構的業務指導；至於橫的方面，則是不同等級的黨組織對同級新聞媒體的直接領導，如此縱橫交錯，以確保所有新聞媒體皆為共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服務。關於其間之等級結構與體系，如圖一、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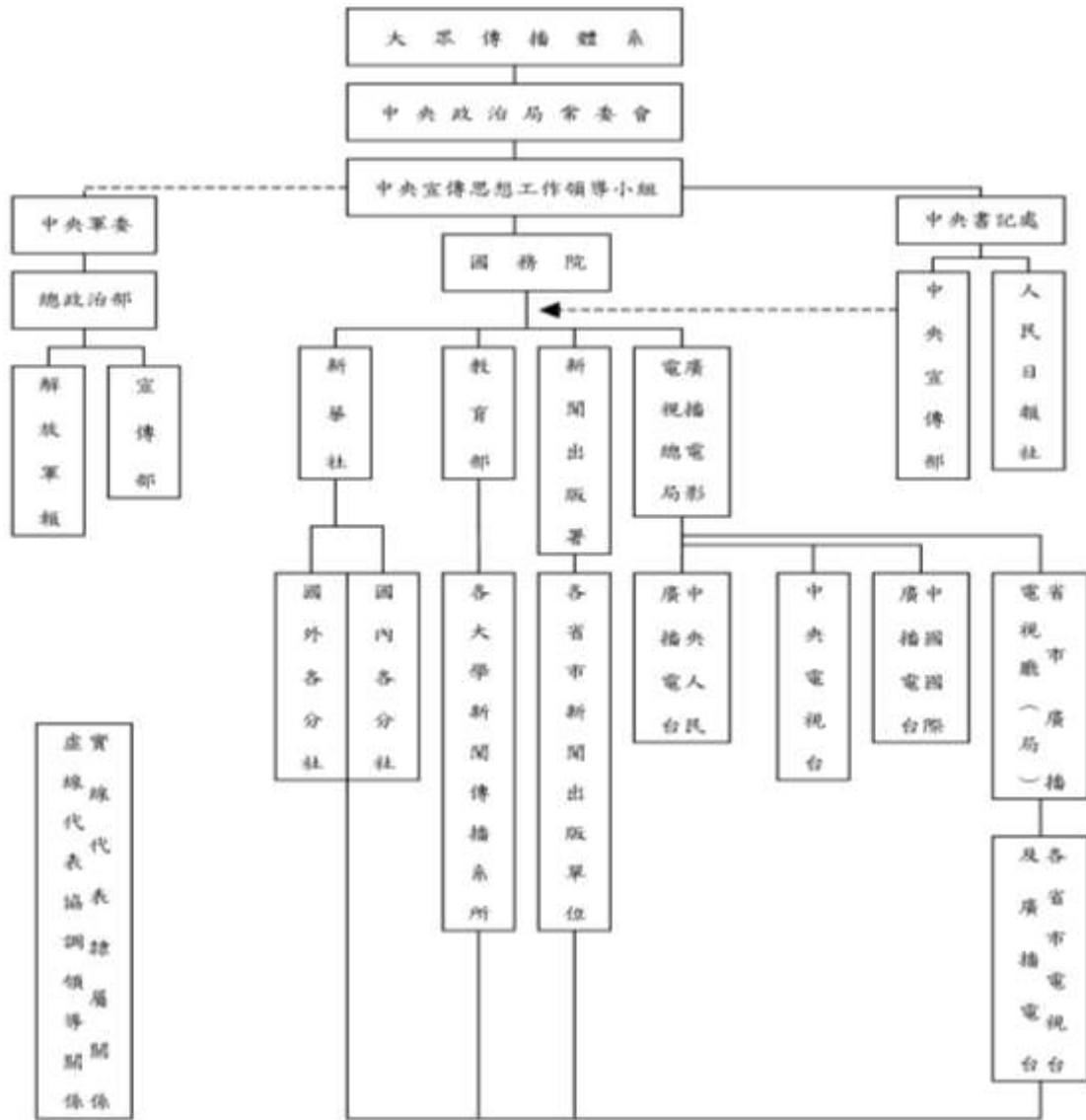
圖一 中共新聞體制等級結構圖

資料來源：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頁91。

因為對政治宣傳工作的重視，中共始終將新聞媒體視為對大陸人民進行政治灌輸、改造人們思想的主要工具。特別是近年來大陸的廣播、電視等電子傳媒亦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亦已成為中共的主要喉舌；而大陸人民即透過這些廣播、電視等電子傳媒的播放、和報紙的社論、評論以及有關政治的理論文章等印刷傳媒，來理解和認識中共的方針、政策。

由於新聞傳播媒體在中共意識型態的理論宣傳中所處的主角地位，致使大陸形成了一個以中共中央為主導，不同類別、不同層次、不同文種並舉的新聞傳播媒體的結構(1994：70)。

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下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圖二 中共大眾傳播體系圖

資料來源：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頁115。

(二) 中共新聞媒體在政治發展中的運用

基於新聞傳播媒體已被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等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致使其主要功能亦被界定為「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服務」。中共發端於1978年的經濟改革的初衷是「改革救黨」，也就是說，經濟改革是為了挽救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大陸經濟造成的崩潰性局面，平抑大陸人民日益增長的不

滿情緒，而進一步鞏固其在大陸的統治而進行的。中共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對原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進行局部的調整和改造的同時，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以期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促進經濟發展。在這一改革的進程中，被中共稱之為「黨在政治上，理論上和思想上領導戰鬥的武器」的新聞媒體，自然是肩負著任重道遠的責任。

為了有效地推動經濟改革的進行，被定位為「工具」，是中共的「喉舌」的新聞媒體得為共黨擬定的經濟改革政策進行輿論宣傳；如此一來，卻使得長期以來，僅僅作為中共意識型態的武器、政治宣傳的喉舌和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單一功能而發揮作用的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如今隨著經濟改革政策的促使，它則轉變成一個以共黨的意識形態武器為主，同時又為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服務綜合性多功能的工具。

基於要為共黨擬定的經濟改革政策進行輿論宣傳，遂使八〇年代以來的大陸新聞媒體出現一個顯著的變化，無論從傳播內容重點的安排，還是傳播信息的容量，為經濟建設服務這一宗旨都佔據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或很大的比例；除經濟報導之外，社會與文化等發展的新動向包括科技、體育，甚至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題材也大量在媒體上出現，這些都逐步地拓展了大陸民眾的視野（何川，1994：4）。

可是當大陸民眾的視野被逐步地拓展的同時，大陸人民民主政治意識也因此覺悟，雖然這是中共當局所不樂見的，但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以及政治、社會的發展則是有助益的。這也就是傳播學者勒納（1958）在研究如何有效運用大眾傳播媒體以促進國家發展時所指出的，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可以提高民眾識字率，藉以作為提升民眾社會參與、政治參與、經濟參與的基礎，同時可擴展人類的環境，並加強人類應付現代化中的「社會整合」、「內聚力」、「和諧關係」、「分工」、「創新」與「意識培養」等社會能力（鄭貞銘，1981：96；林東泰，1999：197）。

參、中共的政經社會發展

一、中共政經社會的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自1978年實施「經改」以來，在當時領導人鄧小平所提出的「不管白貓，還是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以及「先讓部分人富起來」的論調下，從「市場開放」步入改革，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就以人民的平均收入為例，已從當年的150美元躍升到現在的1300美元；在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下，它已成

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在這同時，中國大陸並積極地發展軍事，冀望亦能躋身於世界軍事大國之列，此可由其連年增加國防預算（由2003年的一千八百八十一億人民幣，增加至2006年超過二千億元人民幣，增長百分之十一），擴張軍備意圖至為明顯。但也正因為崛起速度過快，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並非完全是靠其廣大的內需市場，而是靠著迎向全球化創造了契機（陳依秀、黃創夏，2005/6/16），但這也成為中國大陸的危機，因為它的快速崛起已衍生諸多問題，就國外而言，在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持續的軍力擴張，已引起鄰邦疑慮，「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南方朔，2005/3/17）；另外，在中國大陸的內部也衍生不少問題，如：區域不平衡、城鄉差距、三農問題、貪污腐化、政府財政赤字、社會環境污染等（陶儀芬，2004/1/20）。

二、中共政經社會發展衍生的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快速的崛起，已衍生諸多問題，如仔細探究，其問題可分從國內、外二方面說明之：

（一）國內方面

關於中國大陸內部因快速的經濟成長所衍生的問題，歸納學者的研究，擇其要者，不外乎下列四項（陶儀芬，2004/1/20；陳依秀、黃創夏，2005/6/16；許志嘉，2006/3/23）：

1. 貧富差距過大，影響社會和諧

「貧富差距」是中國大陸2006年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關心的主要議題之一，但也說明貧富差距持續快速拉大，正衝擊著這個當年主張打倒不平等，以無產階級革命為號召的中國共產黨政權。

中國大陸貧富差距問題究竟有多嚴重？以國際間最常用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1978年基尼係數還不到0.3，如今就中國大陸官方估算的基尼係數是0.45，早已超過0.4的警戒線，不到30年，中國大陸已從收入相當平均的社會，進入所得分配極不平均的社會，依據北京波士頓諮詢公司的估算，中國大陸0.5%的家庭擁有全國60%以上的個人財富，與美國相較，美國5%的人口擁有全美59.2%的財富，換言之，中國大陸財富集中程度幾乎是美國的十倍（許志嘉，2006/3/23）。

依據統計，中國大陸目前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資產的富翁已有五百萬人，相對於富豪增加快速，貧民人數仍然佔極大的比例；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顯示，農村地區年均收入在九百二十四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三千七百元左右）以下的貧窮人口約一億人，加上城市近三千萬貧民，總計

一億三千萬人。

貧富差距問題已成為中國大陸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貧民為求生存鋌而走險，相對增加社會治安問題；二方面，農村貧民和城市下崗失業貧民為求公平，不時出現示威抗爭的群眾運動；再者，社會不平衡心態正隨著差距的持續擴大而增加，「仇富」心態激化了社會貧富階層的對立。

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影響社會和諧，若不能妥善解決，將直接衝擊共產黨政權，固而已成為中共領導者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問題。

2. 官商勾結腐化，影響政府效能

腐化（Corruption）可界定為政府官吏為達到私己目的而違反公認的規範的行為。雖然說腐化在每個社會都可見，但腐化的程度與快速社會經濟變遷有相當的關係，它都是在現代化進行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

何以現代化會衍生腐化？學者們的研究，其原因不外乎下列三項：第一，現代化意味社會價值基本上發生了變化；第二，現代化創造新財富和權力來源，擁有新資源者崛起之後，圖謀在政治領域佔據一席之地的結果；第三，現代化促成政府權力和活動範圍的大幅度擴張，因而產生許多貪污腐化的機會（江炳倫、張世賢、陳鴻瑜譯，1985：52）。

改革開放後，固然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將中共一系列有關經濟的政策、決定計畫都開始見諸媒體，甚至除了經濟報導之外，社會與文化等發展的新動向包括科技、體育，甚至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題材也大量在媒體上出現，這些都逐步地拓展了大陸民眾的視野，許多新政策給新富階級有發跡的機會，但在這同時也給一些不肖的大小官吏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官商勾結、貪污腐敗情況普遍且嚴重（如北京副市長劉志華於6月初即因「腐敗墮落」，被閃電撤職；在這同時，福建工商局局長周金火亦因貪瀆事件被揭發而逃逸無蹤）（《中國時報》，2006/6/16），非但影響中共政府效能，也因此使得有權有勢的人更容易利用權錢結合，積累財富，當然也令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更快速地加大。

依據媒體的披露，中國大陸的富豪主要是以私營企業主、國企幹部和黨政幹部為主，又根據統計，中共的官員每年用在公家車輛和公款吃喝的支出，高達六千億人民幣（約合台幣兩兆四千億元），相對於官員的浪費公帑與腐化，多數老百姓還在為生活的溫飽而擔憂時，也難怪會激起民怨（許志嘉，2006/3/23）。

3. 三農問題嚴重，衝擊共黨政權

「貧富差距」是中國大陸2006年3月的人大、政協會議關心的主要議題

之一，而另外深受重視的議題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因它們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與否的衝突點，甚至關係到未來五年的五年計畫成敗的規劃（路佳，2006/3/23）。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二十多年來，一小部份的人固然是富起來了，但絕大多數的人卻還在擔憂沒錢看病，沒錢繳學費，生活仍然困苦，其中多在農村地區；依據中共官方統計，農村地區年均收入在九百二十四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三千七百元左右）以下的貧窮人口約一億人，若採行世界銀行標準，農村貧民就增加為兩億人（許志嘉，2006/3/23）；依據中共「三農」問題專家們的研究，農村負債是中國大陸新農村建設必須要著重解決好的一個問題，它已成為制約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因素，依據中共的估計，目前農村負債總額已達到五千三百五十五億人民幣；而導致農村之所以負債嚴重的主因，則是中共長期以來公共建設的重城市，輕農村的結果（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有限的衛生資源，80%集中在城市，農村只有20%，在財政對文化建設的投入中，農村所佔比重還不足30%），雖然農村的公共建設不足，有些農村是「有錢要建設，無錢借錢也要建設」，於是農民不惜高利借貸，自己籌資修建學校、道路等公共基礎建設，但也因此背負沈重的債務負擔（路佳，2006/3/23）。

除此之外，加入WTO後，對農業已造成不少的影響，這對中國大陸的農民、農村而言，不啻雪上加霜，中共官方亦深刻體認到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所謂三農問題的嚴重，若不能妥善處理，它們非但將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與否的衝突點，甚至會衝擊到共黨政權。

4. 經濟發展失衡，拉大城鄉差距

中國大陸自1978年實施經濟改革政策後，在鄧小平的所謂「不管白貓，還是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論調下，相繼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及大都市實施經濟特區等方式來發展經濟，長期以來，政策上重城市，輕農村的結果，非但造成經濟發展失衡，而且也使得農村與全中國平均水準的差距、農村與城市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城鄉差距的問題如不能提出解決的辦法，將成為中共內部潛在的不確定因素。

事實上，中國大陸內部因快速的經濟成長所衍生的問題，除貧富差距過大，貪污腐化嚴重，三農問題以及城鄉差距之外，另如偏重經濟層面發展，且只求快速的經濟成長之下，卻付出環境污染，能源資源緊縮等的慘痛代價，還有房價的節節高漲、國有銀行過高比例的壞帳以及政府財

政赤字等，都讓中共當局頭疼不已。

（二）國外方面

中國大陸因快速的經濟成長致使其在國際上滋生的問題，歸納學者的研究，擇其要者，則是因其崛起過速，而引起鄰邦的疑慮。

誠如前述，在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下，它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在這同時，中國大陸並積極地發展軍事，冀望亦能躋身於世界軍事大國之列，故而其連年增加國防預算，已由2003年的一千八百八十一億人民幣，增加至超過二千億元人民幣，增長為11%，基於其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持續的軍力擴張，遂有學者如：大前研一據此而斷言，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區域強權，並對美國所領導的現有世界秩序形成嚴重挑戰（陶儀芬，2004/1/20）；導致一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當然此種威脅論已招致周邊國家的戒心，如：日前美日安保同盟將「台灣海峽」列入共同防禦範圍；澳洲政府拒售中共無人偵察機技術…等；這些對於中國大陸的國家發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化解並消彌國際上的疑慮，則是中共領導菁英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肆、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下的角色與作用

一、中共當前的政治發展策略與新聞政策的擬定

（一）中共當前的政治發展策略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作為2006年至2010年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施政綱領與願景。

根據中共「十一五規劃」文件內容顯示，在市場經濟轉型階段，中國仍面臨嚴峻的經濟、社會挑戰。例如，粗放的經濟高增長模式仍未有效改善；產業結構失衡調整不易；失業問題惡化與就業難度增加；能源不足與資源使用效率偏低；市場創新與國際競爭力不足；所得與區域差距擴大，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三農」問題中農民所得偏低與幹部矛盾仍尖銳；社會保障制度與體系不完善。

未來五年中國大陸的發展策略，基本上就如同學者斐敏欣所明白表示的，「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只想保持現狀，並無意願真正從事進一步的改革」（《蘋果日報》，2006/4/19）。因為仍是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所謂穩定政權的漸進改革，此乃係從中共「十一五規劃」文件內容所呈現出來的，因中共將過去五年「計畫」概念修正為五年「規劃」，凸顯市場機制與運作取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經濟成長品質；持續推動宏觀調控，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整飭經濟秩序；採取平

衡區域發展策略，鞏固西部、東北，強化中部地區發展；提升能源使用與經濟效率；強化企業國際競爭力，訴求品牌與自主創新價值；縮小貧富、所得與區域差距，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強調人文素質與社會協作能力，建構和諧與小康社會。至於在政治改革方面，要走向學者所謂的政治多元主義，基本上仍極為有限，頂多是侷限在非常基層的層次，也就是非屬政府體系的村民或居民委員會，至於作為政府的最基層組織——鄉鎮和區，其首長仍未直選，而人大選舉的開放也非常有限（時報閱讀網，2006/6/20）。事實上，它只強調肅貪、防止腐化，且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內的調整，因此，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則只是為了鞏固共產政權的系列針對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罷了。

擇其要者，不外乎下列六項：

1. 政治肅貪揭弊，堅持共黨領導

雖然說腐化在每個社會都可見，但腐化的程度與快速社會經濟變遷有相當的關係，它都是在現代化進行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尤其是在欠缺有效在野政黨監督的國家，在私人的、家族的、派系的利益漫無約制的社會，腐化最為猖獗。有學者研究指出，腐化雖然會損傷政府的行政體系，或致其長久軟弱無能。但腐化有助於在野政黨的茁壯發展，甚至政權輪替，因而對政治發展有所助益。無怪乎，學者哈靈頓（Harrington）直言道：「一個政府的腐化，是另一個的新生。」（江炳倫、張世賢、陳鴻瑜譯，1985：60）。

中國大陸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快速社會經濟的變遷，腐化的程度日趨嚴重，故而迭有政治改革的呼聲；當然，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只想保持現狀，且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狀況下，並無意願真正從事進一步的改革，更遑論政權輪替，但又唯恐日趨嚴重的腐化，非但招致民怨，更會衝擊到共產政權；遂採行積極地肅貪揭弊的策略，以鞏固共黨政權。

2. 經濟平衡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誠如前述，中國大陸自實施經濟改革政策後，在鄧小平的所謂「不管白貓，還是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論調下，相繼在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及大都市實施經濟特區等方式來發展經濟，長期以來，政策上重沿海，輕內陸；重城市，輕農村的結果，非但造成經濟發展失衡，而且也使得農村與全中國平均水準的差距、農村與城市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誠如前述，貧富差距問題已成為中國大陸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貧民為求生存鋌而走險，相對增加社會治安問題；二方面，農村貧民和城市下崗失業貧民為求公平，不時出現示威抗爭的群眾運動；再者，社會不平衡心態正隨著

差距的持續擴大而增加，「仇富」心態激化了社會貧富階層的對立。為縮小城鄉差距，以及社會的和諧，遂採取平衡區域發展策略，不但鞏固西部、東北，並強化中部地區發展。

3. 社會流動緩慢，制約政治參與

現代化將使社會走向多元化，不但包含許多不同的宗教、種族和語言群體；此外，現代化亦把原本不存在或被摒棄於政治圈外的社會和經濟集團帶上政治舞台，這些集團或成為政治體系所吸收同化，或成為反抗政治體系的溫床。此係因經由現代化所引起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擴張的結果（江炳倫、張世賢、陳鴻瑜譯，1985：410）。

事實上，就誠如傳播學者勒納（1958）所指出的，在國家發展過程中，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傳布，不但提升了民眾的社會參與、經濟參與和政治參與，同時可擴展人類的環境，並加強人類應付現代化中的「社會整合」、「內聚力」、「和諧關係」、「分工」、「創新」與「意識培養」等社會能力（鄭貞銘，1981：96；林東泰，1999：197）。

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當大陸民眾的視野被新聞播媒體宣導中共經改政策的同時亦被逐步地拓展時，大陸人民民主政治意識也因此覺悟，有鑑於此，中共於其「十六大」中，除將「三個代表」正式納入共黨的章程外，並同意資本家入黨，另在政治體制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堅持「由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和其它人民武裝力量」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換言之，在如此的體制下，對於民眾的政治參與，是非常有限的，多侷限在非常基層的層次，也就是非屬政府體系的村民或居民委員會，至於作為政府的最基層組織——鄉鎮和區，其首長仍未直選，而人大選舉的開放也非常有限（時報閱讀網，2006/6/20）。

4. 軍事積極變革，躋身軍事大國

雖然「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但中共仍持續的擴張軍力，並積極地從事軍事事務變革，以走向軍事現代化。此可由中共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在其〈安全形勢〉章節中指出：「世界軍事變革迅猛發展，軍事力量對比出現新的嚴重失衡。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在軍事領域廣泛應用，戰場向陸、海、空、天、電多維空間擴展，中、遠程精確打擊成為重要作戰樣式，戰爭形態正在向信息化方向發展」（吳恆宇，2004：52）。

共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亦指出，「迎接世界軍事發展的挑戰，...。隨著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並廣泛運用於軍事領域，未來戰爭中

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大」(《求是》，1998/3)。面對世界軍事事務革命的新形勢，中共美其名為所謂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但中共亦坦承，其與美國等軍事強國相較，仍有一定的軍力差距。所以在新軍事革命方面，更要大力依靠科技的進步，以提高其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David Lampton, ed: 金鑫、徐曉萍，2002: 220)。

由中共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以及中共軍方領導人的談話，足以說明，中共仍持續的擴張軍力，並積極地從事軍事事務變革，以走向軍事現代化。

5. 重視生態能源，強化基礎建設

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致使其能源環境壓力也日益凸顯；依據中共官方的統計，其能源儲備狀況並不樂觀，人均能源可採儲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石油可採儲量、人均天然氣可採儲量、人均煤炭可採儲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搜狐財經，2006/3/13)。事實上，自2004年以來持續發生的煤荒、油荒、電荒等能源「三荒」，相對地亦反映出能源建設在國家發展建設中的迫切性和不可替代性。雖然如此，但能源利用效率卻比先進國家落後20年，相差10%；而能源消耗強度則大大高於發達國家及世界平均水準，約為美國的3倍，日本的7.2倍。

換言之，一方面是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的高度需求，另一方面是能源浪費嚴重和並不樂觀的能源儲備，如何解決其間的矛盾，這是中共當局不能迴避、且是迫在眉睫、亟待解決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下，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以及土地沙漠化的日趨嚴重，都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因此，中共總理溫家寶表示，將從今年開始的「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使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基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能源經濟學的重要指標，如今卻將之提升為經濟政策層級，相對地，此亦說明中國大陸能源環境壓力的嚴重性與急迫性。

6. 和平發展論調，消彌威脅疑慮

當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持續的軍力擴張下，乃有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區域強權，並對美國所領導的現有世界秩序形成嚴重挑戰的論調產生；導致一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為了消彌國際的疑慮，日前中共總理溫家寶訪美時，在哈佛大學演講中，用「和平發展」來描繪中國未來形象。事實上，「和發展」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為消彌「中國威脅論」，指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所率領的理論班子所發展出

來的理論。根據鄭必堅的詮釋，「和平發展」的路線有三個重點被強調：一是中國經濟發展要「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二是中國「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三是「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陶儀芬，2004/1/20）。

事實上，就誠如學者陶儀芬所指稱的，中共高層領導人認識到目前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還是自己，更何況，當前由美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世界秩序對中國要解決內部經濟問題是有利的，因此選擇了一種支持現狀、多層次、非零和的「和平發展」戰略（陶儀芬，2004/1/20）。

（二）當前的政治發展策略下中共新聞政策的擬定

誠如前述，新聞傳播體制是指一個國家的新聞傳播事業的總體結構，以及國家對新聞傳播事業和新聞傳播活動進行協調和管理的體制。新聞政策則是在相對應的新聞體制下對新聞傳播媒體進行協調管理的具體辦法和措施。在中國大陸的共黨一黨專政之下，現行大陸的新聞體制是由中共直接控制並為其服務的一種體制，而傳播活動的目的以及達到這個目的之中共所制定的政策，則是由中共不斷根據其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制定出一系列有關的新聞政策和工作原則，以對媒體和傳播活動進行管理和控制。在中共如此新聞體制及政策的制約下，新聞媒體直接代表政治權力說話，政治權力的意志就是新聞媒體的意志，而新聞媒體則成為政治權力的代表（何川，1994：165）。

論及中共新聞政策的制定，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識型態領導小組來制定，這個小組的負責人一般都是共黨的最高領導人。例如毛澤東之後，在80年代由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負責，後由江澤民接任，目前則由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負責（何川，1994：44）。就中共現階段的政治發展策略而言，對內是為了鞏固共產政權的系列針對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對外則為了消彌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中共採取的是「和平發展」的戰略。按照中共一貫的宣傳策略，此成為其當前的新聞宣傳重心，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新聞媒體在中共政治發展策略下扮演的角色

無可諱言的，新聞傳播媒體在國家政治發展中確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傳播學者鄭貞銘因而認為，新聞傳播媒體在開發中國家是一個改變的代理人（change agent），它扮演了三種角色：（1）瞭望人與報導者。（2）決策者與領導人。（3）教師。學者鄭貞銘明白指出，在開發中國家，大眾傳播的成長必須與其它建設如教育、經濟、政治等齊頭並進，唇齒相依，事實上，它本身並無

作用，可是由於它有擴大、複製的特性，以及報導、解釋、忠告、娛樂的功能，故在民智未開的開發中國家，能很經濟的執行許多任務，所以深受重視（鄭貞銘，1981：95-96）。

然而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歸納言之，不外乎以下三項：

（一）是共黨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

在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中，中共冀望其新聞媒體首要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共黨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基本上，就是當年列寧所多次強調的，「報紙是黨和蘇維埃政權中的集體組織者，是建立與勞動群眾聯繫並把他們團結在黨和蘇維埃政權周圍的手段」。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一直秉持著在一九四八年，毛澤東所強調的：「黨報的基本任務是正確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並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以及黨的政策」（毛澤東，1990：71）。也就是說，在中共眼中，新聞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就是宣傳共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為政治服務的。簡言之，在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灌輸共黨的意識型態。故而在當前只是為了鞏固共產政權的系列針對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的發展策略下，新聞媒體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仍是共黨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的角色。

（二）是中共政令宣導的鼓吹者

無可諱言的，就誠如學者陶儀芬（2004/1/20）所言，中國領導菁英認識到目前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還是自己，不是任何其他強權。當前的發展策略，宜以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為主。

誠如前述，為了鞏固共產政權的系列針對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已成為中共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在中共傳播媒體的黨性原則、輿論導向的灌輸性及正面宣傳的原則下，其新聞媒體自然是不斷地報導。此亦說明中共冀望其新聞媒體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中共政策宣導的鼓吹者。

（三）是中共國際宣傳的工具

國際傳播在國際關係中不但可加強各國人民的了解，促進文化流通，並且又是各國政府操縱本國外交，傳達本國對國際事件的觀點，配合政府行動，影響國際輿論、維護本國利益、實施本國國際戰略的重要工具。

當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持續的軍力擴張下，導致一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為了消彌國際的疑慮，中共以「和平發展」戰略來因應。就誠如學者陶儀芬（2004/1/20）所言，中國領導菁英認識到目前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還是自己，不是任何其他強權。

更何況，當前由美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世界秩序對中國要解決內部經濟問

題是有利的，因此中國大陸將持續參與經濟全球化、並支持由美國主導、維繫經濟全球化順暢運作的政治秩序。基於中共領導人認識到其發展是13億人口發展的「大規模難題」，所以很務實地選擇一種支持現狀、多層次的、非零和的「和平發展」戰略。

為了消彌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中共採取的是「和平發展」的戰略。但要在國際上型塑成「和平發展」的形象，勢必得藉助新聞傳播媒體的宣傳；基於此，亦說明中共冀望其新聞媒體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中共國際宣傳的工具。

伍、結論

綜合上述可知，中國大陸當前的發展策略，基本上就如同斐敏欣所明白指出的，「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只想保持現狀，並無意願真正從事進一步的改革」（《蘋果日報》，2006/4/19）。依據中共「十六大」，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堅持「由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和其它人民武裝力量」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若檢視中共當前的發展策略，它只強調肅貪、防止腐化，且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內的調整。顯而易見的，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只是為了鞏固共產政權的系列針對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罷了。

一向被視為共黨的喉舌、政治宣傳工具，並受到嚴密控制的新聞傳播媒體，在近年逐漸走向產業化、集團化的狀況下，並在胡錦濤、溫家寶穩定政權為前提下的政治發展策略中，它們在其間扮演的角色與作用，首要是共黨的喉舌與集體組織者。再者，因中國領導菁英認識到目前中國崛起的最大障礙還是自己，不是任何其他強權。故而當前的發展策略，宜以中國大陸內部因政經社會變遷所衍生的問題作調整為主，在中共傳播媒體的黨性原則、輿論導向的灌輸性及正面宣傳的原則下，中共冀望其新聞媒體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中共政令宣導的鼓吹者。又適值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與持續的軍力擴張下，導致一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為了消彌國際的疑慮，中共以「和平發展」戰略來因應。基於此，中共又冀望其新聞媒體扮演的角色與作用，是國際宣傳的工具。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分

- 毛澤東（1958）。《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0）。〈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王佳煌（1998）。《國家發展》。台北：台灣書店。
- 江炳倫、張世賢、陳鴻瑜譯（1985）。《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 江澤民（1990）。〈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幾個問題〉，《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編（1999）。《傳播與社會》。台北：揚智出版社。
- 何舟（1993）。〈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何川（1994）。《中共新聞制度剖析》。台北：正中書局。
- 李瞻（1981）。《世界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
- 李瑞環（1990）。〈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吳恆宇（2004）。《中共新軍事革命人才培育與院校教育改革》。台北：大屯出版社。
- 林文斌、劉兆隆譯（1998）。《政治學（上冊）》。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
- 林東泰（1999）。《大眾傳播學理論》。台北：師大書苑。
- 周鴻鐸等（1997）。《傳媒經濟學》。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 胡耀邦（1985）。〈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中國新聞年鑑》。北京：中國新聞年鑑社。
- 胡耀邦（1990）。〈關於黨的新聞工作〉，《新聞工作文獻選編》。北京：新華出版社。
- 南方朔（2005）。〈《反分裂法》表象後的真相—逼出美日不能說的底牌〉，《新新聞》第941期2005/3/17。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陳鴻瑜（1992）。《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陳依秀、黃創夏（2005）。〈中國經濟學家胡鞍鋼：崛起的中國不能跟隨美國模

徐蕙萍

- 式》，《新新聞》第 954 期 2005/6/16。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楊宏山等（2004）。《當代中國政治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邵培仁、陳兵（2003）。《媒介戰略管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徐蕙萍（1989）。《中共「新聞改革」之研究—以中共的報紙為主》。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蕙萍（2004）。〈中國大陸體制下報業集團化之析探〉，《復興崗學報》第 82 期。台北：政治作戰學校。
-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編（2003）。《中國大陸綜覽》。台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 許志嘉（2006）。〈貧富差距衝擊共產黨政權〉《新新聞》第 994 期 2006/3/23。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張多馬（1995）。《大陸新聞業概況》。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陶儀芬（2004）。〈用新腦袋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新新聞》第 881、882 期 2004/1/20。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黃城（1989）。《中華民國國家發展體系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力丹（1999）。《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鄭貞銘（1981）。《大眾傳播與現代化》。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鄭貞銘等（2003）。《新聞新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盛沛林主編（2000）。《軍事新聞學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路佳（2006）。〈以三農主義統一新中國〉《新新聞》第 994 期 2006/3/23。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蕭新煌編（1985）。《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求是》半月刊，1998/3。
- 《人民日報》海外版，1989/11/30，第一版。
- 《人民日報》，1996/9/27，第一版。
- 《中國時報》，2006/6/16），A13 版。
- 《蘋果日報》，2006/4/19，A17 版。
- 時報閱讀網，2006/6/20，<http://www.readingtimes.com.tw/books/book>。
- 搜狐財經，2006/3/13，<http://business.schu.com>。

（二）西文部份

Chang, Won Ho (1989) *Mass Media in China: The History and the Future*.

新聞媒體在中共當前政治發展策略下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Ames : I ow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Defeur,Melvin, (1970) .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 David McKay.

Howkin,John (198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N.Y. : L.

Mcquail,Denis,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 An Introduction*.CA : Sage.

(投稿日期 : 95 年 6 月 21 日 ; 採用日期 : 95 年 8 月 2 日)